



革命红旗万岁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金寨县革命斗争回忆录

革命红旗万岁

中共金寨县委委员会编

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962年·合肥

封面、插頁設計：于 雁

革命紅旗萬歲

中共金寨縣委員會編

★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)

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2號

安徽印刷廠印刷 安徽省新華書店發行

★

開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張：7 $\frac{3}{8}$ 字數：170千 插圖：7

1962年11月第1版

1962年11月合肥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5,000冊

內精裝本：450冊

目 录

生命的火花	林維先(1)
第一砲	傅紹堂(15)
農协会	紀华英(19)
太平山起义	汪永坤、周华庭(24)
要活, 只有革命	夏 云(47)
找紅軍	夏 云(52)
乔装取商城	陈伯祿(59)
巧取鍋棚	刘西龙、馬德富(64)
強攻茨山城	李傳奎、李傳国(73)
官庄歼敌記	丁宋明(80)
白区打粮	李中恆(84)
揮旗山上的“孔 吻”	李 耀(89)
打毛排	高祖宪(97)
做 斋	丁江城、林英桂(103)
保卫紅色土地	徐海东(106)
播下紅色种子	夏 云(118)
战斗在金剛台上	李春华(126)
瞭望哨	曾广坤(135)
第三紅軍医院	蔣本山(137)

在革命的道路上	張尚文(142)
终于回来了	汪立庭(156)
等紅軍	汪立庭(165)
“难民所”里的斗争	張經安(170)
不去“感化院”	曾昭友(178)
赤南行	李世焱(184)
下山	徐其昌(200)
紅軍女排长	曾靜华(207)
余鴻堂烈士	刘昌厚、江求均、陶尔福(212)
我們的营长	汪永坤(227)
后記	(232)

生命的火花

林 維 先

我的家乡——安徽省金寨县，是个老区。远在一九二四年，董必武、陈潭秋和肖楚女等同志就在那里领导农民运动。一九二七年就有了农协会组织。党领导广大农民掀起减租、减息的斗争。一九二九年，红军来了，一连串的事情教育了我。一年后，我参加了红军，并且加入了共青团。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，但印象之深，至今犹历历在目。

謎

一九二七年，我十六岁，一不识字，二不懂世事，是个标准的“地里娃”。那年头军阀当道，土匪如毛，搞得鸡犬不宁。尤其是李老末那股土匪，足有上千号人，老百姓暗叫他们为“閻王”；一听到李老末那帮“拿枪的”来了，就扶老携幼、挑担背箩，逃上山去避难。

这一天，我正跟父亲在地里耙土块，忽听到东头发出一阵轰隆隆声，随着声音，又涌来一伙人，一边跑一边喊着：“拿枪的来了！”我赶忙放下锄头，跟着爹就跑。

我一口气奔上山岗，找了一个山洞藏身，一直等到天黑。可

奇怪，今天山下倒很寧靜，我想出洞去探探，但又怕李老末那股強盜施計，不敢出去。

在黑黝黝的山洞里，好容易度過了一個漫長的黑夜。天一明，實在憋不住了，我第一個偷偷地溜出洞口。往山下一瞧，可怪，村里沒有拿槍的，一堆堆的鄉鄰象在討論什麼。我心里詫異，便急急忙忙往山下跑，一路上見到回去的人可不少。跑到轉角上，人越來越多，擠得密不通風。我懷着好奇心，一股勁地往里鑽，費了好大勁，才到了里边。一看就怔住了，我前面的那棵大樹下，躺着三個肥頭大耳的屍體，正是蔡家畝三個赫赫有名的財董。財董怎麼會躺在这里的呢？我望望周圍站着的人們，人們臉上現出各種不同的表情：有高興的，有表示驚奇的，有的正指手划腳地談論着這件事。我旁邊站着一高一矮兩個人，那高个子噴了噴咀，伸手指了指屍體說：“我看准是和閻王鬧反了！也許少了錢，狗咬狗。”

“不，”那個矮的說，“要殺也不會三個一齊殺，李老末盼什麼着？”他忽然放低聲音：“我看准是‘黑殺黨’，是啊，准是他們。聽說六安、霍山都搞過那麼一回，這‘黑殺黨’還專治財董哩。”

“‘黑殺黨’，專治財董。”我的腦子里盤旋着一個又一個的問題，他們是好是壞，他們在哪里？我再想探聽，那矮漢已經鑽出了人堆。

問問看，也許這是一支專打不平的部隊。被好奇心促使着，我跟着鑽出人群，追上那矮漢問：“你說的‘黑殺黨’在哪？他們真是好人？”那矮漢給我問得一楞，停了一下，他拍拍我的肩膀說：“近在眼前，遠在天邊，算是好人也不錯。”說完他嘿嘿地笑了。

我这才知道世界上拿枪的并不一样，还有一种拿枪的是专治富人的。可是，他們在哪里？此后，只要別人一提“紅党”、“黑党”，我就豎起耳朵听着，竭力探求着有关“黑杀党”的謎。

暴 动

蔡家販土豪被杀后，过了三个月，一九二九年春天，金家寨、丁家埠、李家集一带终于掀起了农民起义的怒涛。

三月，在皖西，天气还很冷，但在穷人心里却燃起了熊熊烈火；大伙下田少了，村里也常常見到一些素不相認的人。我父亲，这个素来被称为老实人的老头，也活跃起来了，到家里来找他的人很多。

一天，我父亲打发我到离家十几里的姊姊家里去。就在那天半夜，睡梦中听到一陣鑼鼓声。我爬起来往外一看，只見丁家埠那头紅光閃亮了半边天，人声枪声混成一片。我不知出了什么事，想回去看看，可是姊姊說啥也不答应。天剛亮，我連早飯也沒吃，就急忙赶回家去。一路上，过路的人群都在談論着，說是昨夜李家集、丁家埠出事了，說什么农民暴动了。……我走进村里，看到人們一个个嘻笑顏开，連走路也輕松了。認識我的人，兴奋地告訴我：昨夜农民联合起来的队伍，冲进民团局子，杀了土豪劣紳，把民团的枪也給繳了。我高兴得跳起来，真后悔沒能参加这个真够劲的暴动。跑回家里，父亲也喜孜孜地与我講述了参加暴动的經過。

暴动是由抗稅引起的。那夜灯火通明，农民們拿着自己的鋤头、紅缨枪、梭标，冲向街头，杀进民团局子里。土豪劣紳吓傻了，民团們乖乖地繳了枪。农民們分了地主的粮食，燒毀了田契、

借据。穷人們一边走还一边打鑼敲鼓，高呼口号：“打倒土豪劣紳，打倒貪官污吏！”“有飯大家吃，有田大家种！”“沒收土地，分給农民！”“建立穷人自己的政权！”

父亲說完，眯着眼睛光笑，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高兴，脸上閃露着愉快。

“那伙带头的人呢？”我着急地問。不由得又想起了那个“黑杀党”，心里忽然亮堂起来。但是父亲沒有再說下去，停了好一会，他走近我，說：“他們好是好，就怕呆不久。你别乱跑！”父亲不放心我。但是，从来沒有见过这伙好人，怎肯放过这个机会呢？我下决心要去看，也許这些人长着三头六臂，个个是身長六尺的大汉？

紅 軍

我偷偷地走出了家門，迎面見到一个大兵。那汉子不太高，脖頸纏根紅帶，他見我光点头笑。說老实话，他尽管对我笑，可我还是害怕，我想起过去那帮拿枪的，瞪着眼，杀气腾腾的；我不敢走近他，不相信这大兵就是我父亲說的那些好人。我閃过一边，讓那大兵走过去。他穿得还真俐落，稳稳地迈动脚步，連別人家場角上放着的东西也不看一眼。

跑到村西几家老乡家里，那里也有两个纏紅領帶的大兵，周围围着一堆人。我也凑近看看，只見一个老乡手里拿着錢，在和大兵推来推去。我問站在我旁边的老乡，說这大兵叫“紅軍”，是共产党的队伍，方才吃了一碗茶，硬要付錢，老乡不收他不依。

大兵喝茶付錢，这可怪！別說見啦，連听也从沒有听过。我看他們爭了許久，最后还是那老乡輸了，收下了錢。这一来，我

的胆子也壮了，插上去問了几句話。这一問可打开 他的話匣子了，他講什么紅軍打富济貧，打土豪、杀劣紳，政治平等……有人叫他事务长，我也不知道“事务长”是做啥的。他們忙着买这买那，哪件买卖都是和和气气的。我心里捉摸，那伙杀蔡家販財董的“黑杀党”准就是他們，他們准是好人，可他們光說紅軍，有时也提共产党，“黑杀党”三字連半个也沒提。这时我才明白了，他們不叫“黑杀党”，他們就叫“紅軍”，是共产党的队伍。我整天沒事就跟着他們轉。他們在村里住了几天，我差不多天天要抽空去聊一会，很愿意在他們那里，帮他們做点什么。

过了两天，我上姊姊家里去办事，在姊姊家里又遇見那个套紅領帶的事务长，他正在一間小屋旁为几籃子菜发愁。我一看可高兴了，他准是缺人，替他們做些事的机会来了。那时我年紀輕，个儿又长得高，一挑百十斤，一点不觉得什么。我刚想开口，姊夫正叫我：“弟啊，你帮紅軍挑菜去。”我急忙挑起担子就走。来回几十里，我挑得又高兴又起劲，一路上事务长夸奖我身体好，跑得快，还問我家里有些什么人，懂不懂革命。挑完菜，我刚要走，他硬把三块銀洋塞到我手里。这我怎么肯依他，給軍队挑菜还要錢，哪有这种事，何况我又是自愿的。我丢下錢，拔腿就逃。他追上来，說好說歹定要我拿走，还說我不收，就是要他“破坏紅軍紀律”。我只好拿着三块銀洋回到家里，把这天遇到的事对父亲說了。临睡时，父亲叮囑我：“你长大了，就去当紅軍，和他們一起干，要做紅軍那样給穷人出气的好人。”

革 命

一九二九年七月，国民党反动軍队向大别山“进剿”，紅軍

为了保存力量与主力汇合，从金家寨、丁家埠、李家集撤走了。

紅軍一走，敌人又猖狂起来。恶霸、地主、土匪、坏蛋都回来了。第一件事就是捉人杀人，企图扑灭革命的火焰。在敌人回来后不到三天，我父亲也被抓去了。在那些日子里，东田舖給弄得鬼哭神嚎。花了好大劲，請人做保，父亲在受尽酷刑后被放出来了。我們用門板把他抬回来时，这位受尽折磨的老人已經奄奄一息，不到一个月便与世长辞了。父亲临死前，一只手抓着母亲，一只手撫着我的头頂說：“孩子，长大了給我报仇，要做个有志气的人！”說完，眼泪水簌簌地从臉頰上流下来。

“我一定要报仇！”我跪在父亲面前宣誓。

父亲一死，我就要去找紅軍。可是紅軍走了，往哪儿去找呢？我只能在母亲的劝慰下，抑住怒火，吞着眼泪，勉强在敌人的皮鞭下过着奴隶的生活，等待复仇的机会。

好容易熬过了四十天，传来了紅軍从湖北回来了的好消息。我放下活，一口气跑到路口，逢人就說，仿佛这一說心里就舒坦些。紅軍真的回来了，我終于和我的乡邻一起接到了他們。他們回来时打了許多胜仗，一路上解放了鄂豫皖边缘的許多乡鎮。农民們烧水献茶，拿出了自己仅有的一些干粮送給他們。

紅軍一来，可又熱鬧了，搞农会又搞赤卫队。我姊夫还当了赤卫队长。那天他到我家来，問我：“弟啊，你为什么不参加活动？”我說：“想去，不知怎么干？”我姊夫說：“来，跟我去。”就这样我跟着他参加了第一次活动。

那活动是个追悼会。追悼会在南溪举行，規模很大，有成百上千的人。一連开了好几天。农民們一个个上台訴苦，追述四十天受害經過，烈士家属更加激昂悲憤。大家都为死去的烈士难过，有人在会上写血书，宣誓为烈士报仇。我心里充滿了对敌人的仇

恨，暗暗打定主意——參加革命，跟紅軍走。

開完會，我跟着姊夫走回家去。半路上，聽到有人叫我，我回過頭，原來是表兄，他穿着和紅軍一模一樣的衣服，姊夫告訴我，他已經是一個紅軍連里的連長了。我羨慕他，緊緊地瞅着他，心里有許多話想說，他大概看出了我的心事，于是就問：“姊夫當了赤衛隊長，你呢？”

“我，沒什麼。”停了好一會，我不好意思地說。表兄又說，我參加紅軍年紀太小，還是加入少先隊。“對，革命，加入少先隊。”我忽然被他提醒了，並告訴他們馬上加入少先隊，一定革命。當夜我去找村蘇維埃的負責人，他答應了，並且要我明天晚上開會。

第二天晚上，幾十個大孩子擠在一間小屋裏，村蘇維埃的負責人在豆油燈下，給我們講了話。然後一個套着紅領帶的陌生的小伙子，宣讀第一批少先隊員的名單。豆油燈的火苗子給風吹得忽閃忽閃，我們的心里也象火苗一樣，燒得正歡。每讀出一個名字時，場下就有人站起來大聲叫“到”。才開始叫第一個名字時，我就緊張起來，不安地坐在凳上。突然聽到喊“林維先”，我應了一聲到，連說帶跳地站了起來，站在那裏呆住了，不知下一步該怎麼做好。待別人拉我的衣角時，才知道我應該坐下了。

那夜，我很激動，偷偷地跑到父親睡過的床前哭了。要是父親活着該多好，我可以大聲地告訴他老人家：我參加革命了，我加入了少先隊，我學着做好人了。

上 山

加入了少先隊，一切都有勁了。我和少先隊的伙伴們一起參

加生产，一起拿着木棍站崗放哨，有时我們还做些宣传、动员的工作。后来我弄到一支土枪，那家伙，你可別小看，背上它真够劲，我真喜欢它。我背着它押过土豪，送过信，保卫过乡亲下田。我們少先队常开会，組織生活也过得很严，小队长、召集人都是民主选举的。我們队员唯一的标帜是臂上那块紅袖章，別看那么一块紅布，挂上它可真神气。

一九三〇年初，紅軍外綫出击时，鄂豫皖苏区又遭到了敌人残酷的破坏。为着保存革命力量，对付敌人可能的大屠杀，在部队撤离的同时，赤卫队员也撤走了。我們少先队员含着眼泪送別他們，組織宣传队，护送伤病員，帮助大人筹粮，掩护物资，整整忙了两夜。

紅軍一走，敌人跟着就来了。敌人找不到赤卫队员就大肆逮捕少先队员。他們用刀子想吓倒我們，但受过共产党教育，懂得革命道理的少先队员怎么会向他們低头！我們连夜召开了队员會議，都認識到这次斗争是对我們一个严重的考驗，千苦万苦，千难万难，不能投降，不能出卖自己人！我們宣誓：紧紧团结一起，逃到山里去。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，我們还規定了：分散活动，定期联络。我們脫下臂上的紅袖章，把它藏在怀里，每人带上一部分干粮，在乡邻們的帮助下，一夜間全部逃到山上。

我当时躲的是猫儿岭，那岭真高，树很密，山路又凹凸不平，整整爬了一夜。到山頂拣了个山洞，里边鋪上树叶，白天躲在洞里，晚上才偷偷出来活动活动。过了几天，敌人开始恶毒的封山、搜山，这一下可把我們的計劃打乱了。很多队员走散了，有的被捕了，山下又不能接济干粮，我們完全陷入絕境。一、二月的皖西天气格外冷，老天又偏偏刮风下雪，我們不但要和敌人作斗争，而且还要和飢餓，寒冷作斗争。冷了，就团着身子；餓了，就摘

山果野菜、舀死水、啃树皮，几乎过着与原始人一样的生活。縱然如此，我們这些怀里揣着紅袖章的孩子，个个有骨气，沒有一个投降的。就这样熬过了三十八天野人似的生活，紅軍终于回来了。当山下的老乡带着紅軍来山上寻找我們时，我們兴奋得流下眼泪。从洞里出来，插起我們的小紅旗，用餓得沒有力气的手，从怀里拿出紅袖章，……我們不仅有紅旗、紅袖章，我們还都有一棵火热的紅色的心。

下了山，我們又拿起大枪站崗、放哨，掩护老乡种庄稼，帮助赤卫队员分田地，打土豪。此后再也沒有人說我們小了，因为他們知道我們人小志气不小。

入 伍

做了一年的少先队员，我就参加了紅軍，那是一九三〇年的冬天，算算年紀是十九岁。

那时间，苏区巩固了，政府动员苏区人民报名加入紅軍，有志气的都去了。我在会上也报了名，被編在独立旅当挑夫。我年紀輕，个儿高，力气大，干这工作挺滿意。入伍不久，部队接連行軍，我挑上一百多斤东西，跟着营长跑。过了大約一个星期，营长对我說：“小林，要打仗了，你可別怕。”我自然不服气，說：“我沒见过打仗，‘怕’这个字我想也沒想过。”上火綫前，营长給我一面大旗，叫我打着它跟着他跑，我想拿枪杀敌人，营长說紅旗重要，我就依了。

我扛着那面大旗一个劲儿跟着他跑，敌人的子弹嘩嘩地打过来，打得树上的丫叉叉都落下来了，我沒打过仗，也沒见过这场面，真給弄糊涂了。走着走着，我越发奇怪，于是問营长：“营

长，这树丫丫为什么老往下掉？”营长一听笑了，他往我身上一拍，说：“傻瓜，这是子弹打下来的。”“嗨，子弹，这要多少子弹？有那么多子弹！”我第一次知道：敌人的子弹是这样的稠密。营长告诉我，打仗不是闹着玩的，敌人是最凶恶不过的，当兵的头上常常飞过子弹，可子弹不打胆大勇敢的人，它老跟着胆小鬼。我记着营长的话，第一次上阵我也壮大自己的胆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营长还告诉我许许多多有关打仗的常识，譬如说，手榴弹来时该怎么办，卧倒还是后退？什么子弹打出来发出什么声音，多高的子弹又怎么响的？我们的营长真好，至今我还常常想起他。

在独立旅待了不久，我因脚关节发炎，被调到皖东总院养病，后来又在医院里警卫排当战士。医院里住满了伤员，人少事多我有时抽空也上去帮帮忙。我奇怪的是：那些伤得最重的，病势最凶的总是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。有一次，前方抬下来一批伤员，其中一个已经接近死亡了；他伤在头部，伤势很重，我走近他，想为他做些什么，他吃力地动着嘴唇，低声呻吟着。突然，在他身上我发现一个铜扣子，别人告诉我，那是党证，证明他是共产党员。我想为什么党员不怕死，为什么最苦、最困难的地方总是共产党员上去。我联想起了父亲的一句话：长大了当红军，和他们一起干，要做红军那样给别人出气的好人。于是我又想起父亲的死，想起我跪在他床前的复仇宣誓。“当共青团员、当共产党员，我要做一个和他们一样吃苦在先不怕死的人！”我暗暗地下了决心，并且还把我的心愿偷偷地告诉了我们的排长——我们这个排唯一的共产党员张经武同志。张经武同志是个和蔼可亲而做事又极严格的人，打从那次起，他常常找我谈话。有一次，他又来找我谈话，忽然问我：“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革命？”

“打土豪嘛！”我連想也沒有想就回答出來。因為我從來就只知道這麼一點：革命嘛就是打土豪分田地。他听完我的話微微地笑笑，然後又問：“那你知道打土豪又為什麼？紅軍里什麼人最光榮？”這下可把我難住了，我只好回答：“不知道。”從此我就知道世界上還有一種最光榮的人，那就是為別人而活着的人，他們的名字就是：共產黨員、共青團員。

C Y

過了不久，排長告訴我說，政委找我談話。我們政委是個極嚴肅的人，平時不常與人說笑，也不輕易找人談話。我猜想他找我談話一定是我出了什麼大事情。可是出了什麼事呢？我想了半天也沒想出個名堂。我懷着疑團走到政委那里。奇怪，政委並沒有什麼不高興，他看見我進去，就招呼我：“小林，坐吧，我有話與你聊聊。”他一邊說，一邊關上門。我不敢坐，腳跟一靠，說：“政委，什麼事？你說，我堅決執行，我不怕困難！”

“好，很好，不過不是什麼事交你執行，而是答复你一個請求。你坐吧！”我很高興，我拉把椅子坐下，但腦子里却轉着：

“我沒有向上級請求過什麼呀，我對於革命工作也沒有什麼意見。……”政委見我呆着，接下去笑嘻嘻地說：“傻孩子，你不是要加入共青團嗎？”

“是呀，我要加入共青團！”我給他一提，興奮起來。“政委，你看我行不？”我從椅子上站起來走近他。

“你坐下。”他按住我的肩膀又說：“行啊，你可以加入共青團！”這一下我的心亮堂了，原來政委已經同意了。我興奮地說：“那我現在就入吧，政委，今天晚上。”那時我還滿身孩子

气，你看我想的多么简单。政委看见我那股热火劲，笑了笑，停一下说：“你别急，小林，明天晚上你再来，我们还要举行一个仪式。”

“是！”我兴奋地握住政委的手，不知有多高兴。

第二天，我起来特别早，从太阳一出来，我就盼着它下山，好不容易盼到了天黑，我匆匆忙忙地吃了一点晚饭（说实话，我兴奋得连饭也吃不下去），就跑到政委那里。

入团仪式就在政委那间小屋里进行，屋子里陈设很简单，没有挂旗，也没贴标语，只不过放了一张很长的长桌。我去时，政委、排长都早已在那儿，另外还有三个人，都是医院里的。仪式开始前，政委先为我介绍，哪个是党员，哪个是团员，排长和另一个同志算是我的入团介绍人。

宣誓仪式开始了。宣誓是在秘密中举行的。因为那时候白匪军四面八方层层地包围着我们，情况极复杂，党员、团员都是秘密的，自然入团宣誓也只能秘密举行了。

屋子里静得很，我们几个人，按照政委的指示，分坐在长桌周围，政委坐在正中间。他今天穿着得极干净，连脸上的胡子也刮了。

仪式开始，政委从座位站了起来：“今天我代表支部接受林维先同志的入团申请。”政委严肃的语句，象敲响了洪钟，每一个字都牢牢地印在我的心里，“同志”、“入团”这些词，使我打从心坎里感到温暖。政委在说完话以后，又告诉我，要记住两个代号：“CP”、“CY”。他一再叮嘱我不能忘记，“CP”代表党，“CY”代表共青团。我跟着念了一遍。接着入团宣誓开始，大家一起站起来，我站在政委面前，握紧拳头宣誓。誓词由政委先念，我一句句的跟着：“我诚心诚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